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 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张海涛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启蒙运动;文学后果;新时期;后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9)05-0030-04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呈现出一种活跃、多元的积极态势。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断了近50年的五四启蒙传统于此时得以接续。发生在中国第一次社会文化转型期间的西方现代性实践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酝酿着一场类似于五四启蒙运动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一般情况下,人们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新启蒙运动”。伴随着这场“新启蒙运动”,中国文学界也引发了一场以“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为主流的实践与理论变革,并逐渐开始培养起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然而,80年代末期,由于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改变,这场“新启蒙运动”中断了。于此之后,中国文学界也发生了诸多新变。既有对这场“新启蒙运动”成果的吸收、顺延,又有许多新的时代品质。所以今天对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所导致的文学后果的梳理当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的理解、评判与追本溯源。对这一文学后果的考察也将为我们反思这场新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提供重要的端口。

一、新启蒙运动及其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可以

说是知识分子面对“文革”,面对孕育了“文革”时代的历史的一次集体发言。这场运动以“文革”为参照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反思与批判色彩。革命话语督导下的各种泯灭人性、漠视主体的意识形态宣扬与实践于此时不仅得到了彻底的清算,而且还与此相对立建构起了一套以人道主义、主体性思想为基础的思想理论框架。

首先是哲学领域的思想变革与思想建构。80年代初伴随着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出版而引发的“手稿热”,人们发现了一个不肯定主体性、企盼人性复归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李泽厚适逢其时地提出了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的哲学框架,并最终使“实践哲学”取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它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1]。受实践哲学的影响,人道主义思潮也于此时兴盛起来。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宣扬与实践对人性的戕害,也由于以人性的回归来界定共产主义的观点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找到了依据,人道主义得到了诸多理论家的一致赞同。

其次,美学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在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反映论美学于此时得到了彻底地摈弃。李泽厚以实践哲学为背景又于此时建构起自己的“实践美学”框架,并通过“积淀说”试图沟通实践的

收稿日期 2009-03-20

作者简介 张海涛(1982-),山东泰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本质与审美的本质。虽然李泽厚尚未认识到实践本质与审美本质的巨大差异与不可调和性,但实践美学毕竟突破了正统反映论美学一说独尊的局面,并进而取而代之成为80年代的主流美学流派。

在哲学、美学领域思想理论急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领域从理论到实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从理论上来看,8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可以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自律化诉求。刘再复于1986年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认为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应该“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人为中心,为目的”。^[2]这就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属物这一角色中解救出来,回避了革命话语中大肆宣扬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功能,确立起了文学自身的独立价值与审美本质。这样,文学理论界就为80年代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摆脱政治的钳制与刚性意识形态功能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这一时期一度高亢的“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也得到了文学界与文学理论界的广泛响应。其实,“历史”自始至终就是“整个80年代存在着的诸多显性或隐性的主题”^[3]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主题。从革命的梦呓中走出来的人们开始重新打量那些曾经“被特殊的政治禁忌所遮蔽的历史事实”^[3]。要么钩沉历史、补白既往,要么“颠倒原有的经典序列,重新思考和重新命名经典”^[3]。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就是通过对文学经典与文学大师的重新命名与排序来凸显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如凸显沈从文、张爱玲甚至“新感觉派”,更极端的如以金庸取代茅盾等,都是以一种打乱原有历史顺序,消弭原有历史遮蔽的方法来消解原来弥散于文学领域的权力话语与他律诉求,并进而彰显文学的审美属性、超越属性。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文学理论界对“朦胧诗”新的美学风尚、美学原则的发现与肯定(“三个崛起”)就已经表现出对文学领域意识形态话语的明显的反感与反抗。其目的也是着意于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独立价值的张扬与对文学自身规律的维护。可以说,从80年代初直至80年代末在新启蒙运动的感召下,中国文学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上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的中心区域。终于“一个对自律艺术体制的召唤也就隐然成型了。”^[4]

就80年代的文学实践来看,80年代前期的文学实践可以说直接与80年代初所展开的新启蒙运动相呼应,既有对历史进行反思,对革命话语及其所蕴含的宏大叙事进行清理的尝试,如从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又有以《啊,人》和《人啊,人》等小说为代表的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热情呼喊与强烈关注。而且这种对“人”的重新发现与对“人”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也标志着文学自身的蜕变与“文学对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5],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所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文学之外的诸多命题与各种事态的关系仍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普遍关注的话题。

可以说,80年代前期的中国文学仍然徘徊于文学的现实功利价值与文学的独立价值孰轻孰重的歧路上。当然,此时文学的他律诉求已不再热衷于革命话语中它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重大职责与中心意识,而是逐渐以其审美特性来对现实说话、对社会说话、对历史说话。但从80年代前期总体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文学确已逐步从文学与外在关系的辨析中确立自身的方式上转移到了文学自身的切实建设上来。

这一转变在80年代后期的文学实践中更为明显。80年代后期的文学实践在表现时代的同时,将如何进一步展现文学自己的独特性提上了议程。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以及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少功的《爸爸爸》、充满现代意味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甚至王朔的《顽主》,都以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审美探求和作家对文学的独特理解,营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自律化的文学格局。这一时期“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样写’两大命题面前,更多的关心后者。‘形势’的意义、价值和作用在作家们的创作观念中日渐强化起来”^[6]。原来对生活的再现如今也成了对生活的表现,原来对政治、意识形态介入的遵从如今则成了对政治他律诉求的普遍反感与排拒。另外,8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一个影响巨大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寻根文学则不仅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带有强烈本土化追求的文学现象。一方面,80年代前期,对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大量引入,如热闹一时的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与争鸣、有名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文化与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观念与中国国情的不相适应。同时,另一方面,随着新启蒙运动的深入,人们的意识中又普遍放弃了曾经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主流话语的革命话语。这样,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们既对80年代前期几乎一致认同的西方话语产生了怀疑、困惑,又在革命话语失势后一时难以找寻到具有文化归属感的新的话语系统。也就是说,此时的人们陷入了一个由认同危机与归属危机所造就的文化“失语”状态。加之,70年代以日本为主体,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新加坡、泰国等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全面崛起,人们的目光开始投向东亚文化,并开始关注东亚经济腾飞中“儒学”的作用,形成了一股至今仍然颇有声势的“新儒学”文化思潮。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一度踏上了艰难的“寻根”历程。某种意义上,寻根文学的出现,可以看作80年代后期,人们为摆脱文化认同的危机与文化的失语状态所进行的一场乞灵于中国古典文化和中国地域文化的寻求文化归属的努力。单就“寻根文学”本身来看,无论是阿城、李杭育、韩少功还是郑义、贾平凹、张承志都有自觉的文学审美意识。即是说,此时的寻根派作家即使追求文学的某种外在的、文化的目的,这一目

的实现也是建立在维护文学的审美自律性基础上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文学的非功利性来寻求文学的功利性的一种积极的尝试。诚如阿多尔诺所认为的,艺术的越发自律,恰能越好的实现其他律功能。(“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时才出现。”^[6])从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80年代后期的文学、文化寻根“反映了在时代价值转型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文学干预现实的努力”^[5],是“文学对整个社会时代正在巨大选择之中重构意欲的一种积极性呼应。”^[5]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新时期中国文学自始至终割舍不断的启蒙情结。

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80年代中国文学实践与理论的塑造作用可谓极其重要。这股启蒙思潮,不仅使文学理论界将观照文学的眼光从文学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转向文学自身,而且也使80年代的中国文学转向了对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追求和对文学现实功利功能的重新认识。总之,80年代中国文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还有一种浓厚的精英意识与启蒙意识。这一时期的文化英雄还是一些学者和纯文学作家。文学在这一时期的自律化诉求固然使文学的独立价值得到彰显,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但这种自律化的诉求也确在客观上使文学退出了意识形态的中心区域,更使纯文学在面对市场时显得疲弱无力。毋庸讳言,80年代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在客观上促成了纯文学在90年代以后的边缘化命运。90年代,尤其1992年以后,进入所谓的“后新时期”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中国文学显示了更加复杂多变的格局。这虽然造成了梳理这一时段文学理论与实践及其与外在文化思潮关系的困难,但考察这一时段的文学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对我们更好的认识启蒙、认识新的时代氛围里的中国文学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及其文学后果

8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作为其思想呼应的新启蒙运动也中断了。80年代在启蒙思想督导下所形成的单一思想文化空间在此时也倏然崩溃。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意识形态真空”时期。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80年代的启蒙话语逐渐退潮,到了90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7]。“80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能力丧失瓦解”^[7]。一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似乎再难布列成阵,而成了诸多思想声音混战炫武的角斗场。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民间性、多元化和非形而上学化”^[7]已不可避免。

首先,随着新启蒙运动的中断,80年代与启蒙叙事相表里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的无条件臣属和

对现代性的狂热迷恋遭到了冷落与摈弃。人们纷纷将曾经一度伸向国外的触角缩回,潜入传统。既想在欠缺西方话语的处境下寻找新的言说语言,又想迎合此时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社会倡导。于是,一股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弥散开来。这一思潮尤以90年代初的“国学热”为代表。

其次,随着西方现代性神话的破灭,20世纪6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勃兴于欧美大陆。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在经历了80年代中国启蒙话语与现代性话语的落潮后,对彼时知识界狂热迷恋的现代性命题已持观望态度。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话语的一个反动于此时恰好迎合了中国知识界的特殊处境。9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一度兴起了一股“后学”热。后现代主义虽然概念模糊、涵义含混,但仍以其理论的尖锐深厚,以及思想的多元性与批判性填补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空间的缺失,并成为批判80年代的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有力武器。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主张、“小话语”主张也确实适应了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消费化、小众化的趋势,成为新启蒙运动中断后直至新世纪以来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

再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迅速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市场由此开始取代权力而显示出比权力更加巨大的化同力量。人们被裹挟在市场的巨大浪潮中一度失缺了清醒的理性思辨与温厚的人文精神。中国的“后新时期”到来。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大众生活的世俗化与肉身化,并极力抵制商业与市场对大众心灵的吞噬。张扬理性精神,高扬人文旗帜,希图以此拯救人们日益沉沦的精神世界。但受到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断的影响,这批所谓的新理性主义者们(以张承志、张炜为代表)已丧失了启蒙光晕笼罩下的反思力度与批判精神,而只“龟缩于个体精神的小天地,寻找终极关怀,实际回到了独善其身的传统。”^[8]

从90年代以来总体的思想文化状况来看,80年代思想与学术相一致的单一文化空间被打破。学术一定程度上与思想分离,不再迷恋于思想的虚空建构而走上了一条知识化甚至考据化的道路。可以说,90年代以后学术的细致而微已取代思想的粗枝大叶成为后新时期中国学界的新宠。另外,80年代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一致状况在90年代以后也遭到了瓦解。市场的引入使世俗越发醒目而人文越发萎缩。大家在世俗的享乐与狂欢中视人文精神的呼喊为杞人忧天。人文精神那双忧患的眼睛在90年代以后变得不可理喻。躲避崇高甚至漠视、蔑视崇高成为后新时期社会思潮的新风尚。

在新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文学从理论到实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的商品性与娱乐性功能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学是否应该进入市场?文学如何进入市场?文学进入市场将会带来怎样的文学后果?

等问题,伴随着文学商业、娱乐功能的高涨而进入理论家的思考视野。同时,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原来被忽视、冷落的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向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移。不仅拓展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理论视野,更进一步改变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向。另外,随着后新时期以来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消解,文学写作越发变得个人化、多元化、私密化。既有对宏大命题的恪守,又有对私人生活乃至私欲、肉感体验的描摹,还有单纯的叙事变奏、文字游戏。文学理论界面对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也展开了相应的理论思考。如对先锋实验小说的评介,对“下半身写作”、女性写作、少年写手、美女作家等现象的讨论、批判。同时,后现代主义文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理论界很大程度的接纳,并以此为导引开始了对消费社会文学状况的批判。总之,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统一理论空间被打破,80年代一种文学主张、一篇文艺论文就激起全国震动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这已是一个文艺理论的多元时期。可以说,90年代以后的文艺理论状况像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一样——散众化了。

就文学实践来看,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已使与启蒙话语相一致的人文书写变得冷落,文学的现实干预功能也于此时被搁置。新世纪以来,文学虽有向中心位移,希图以极端的方式吸引民众眼球并以此实现自救的努力,如“2001年1月广州诗人在广州街头散发诗歌传单,扬言要用诗歌污染环境的举动;以及2003年3月声势浩大的诗歌反战行动(反伊拉克战争)”^[4],但后新时期以后大众文学、世俗情怀的凸显,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地位的置换与畛域的交叠以及纯文学的边缘化命运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市场的刺激下,后新时期以后,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相伴随,民众的精神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于此时写庸俗、写平凡、写私密成为一种时尚。这期间,既有文学向小人物内心世界的探讨,又有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书写的新变。从林白、陈染到卫慧,从《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到《上海宝贝》,女性以大胆的笔触和细腻的感觉开始构建起自己的文学身份与都市私密书写空间。女性写作成为新启蒙运动中断后一个极富文化与现实内涵的文学事

件。与此同时,纯文学的边缘化日益加剧。实验小说、戏剧、先锋小说、艺术以一种颇具异质性的面目使诸多理论家相顾愕然。不仅一般受众读来一头雾水,就是专业的评论家也时感云山雾罩。但中国文学却确乎在一片实验风潮中,在叙事技巧、文本建构、风格变异等文学的本体性追求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最初的马原、莫言、残雪,还是稍晚于他们的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都在营造自身独特风格的同时努力凸显能指的巨大魅力。可以说,后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所指向能指的转换。总之,90年代以后的文学实践形成了一种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格局。80年代甚至之前中国文学的“共名”格局,如今完全成了一种“无名”的状态。私人话语凸显,启蒙话语仍在,官方倡导不减,但这些声音并不力图以己抑彼,而是容忍共存,安然自处,终于“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9]

三、结语

纵观新启蒙运动直至新启蒙运动中断后的中国文化、文学状况,可以说,话语的转换已是势所必然。现实中,这种转换也已是既成事实。这一转换的原因既来自于权力的主动介入,又来自于市场与经济变革的客观冲击。权力的介入斩断了旧话语的延续而市场的冲击则促成了新话语的建构。80年代以启蒙话语为督导,知识分子大都怀有抚慰创伤的温情,救世的热情和重塑未来的激情。思想文化界固自有一份激浊扬清的劲力,就连文学也显示出一种雄健之风。90年代以后,思想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文学的多元一改中国思想文化往昔的统一格局,中国在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了“战国时代”。文学从整一到多元,从忧患寻根到狂欢、漂浮,不仅没有因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变得脆弱、零落,反倒显示出了更加巨大的活力,更加多变的面貌。所以,我们似乎很难说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之于中国文学的是福还是祸,也很难确定评判新启蒙运动的中断及其所造就的文学后果是用褒扬还是贬抑的口吻。也许,对这一事件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答案吧。

参考文献:

- [1] 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6;182.
- [2]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北京:文学评论,1985:6.
- [3] 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32.
- [4] 郑国庆.艺术自律与先锋派,及介入[J].北京:读书,2003:10.
- [5] 朱栋霖,丁帆.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4;78;81.
- [6] (德)阿多诺,王柯平.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86.
- [7]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M].长春出版社,1999.251;241.
- [8] 林春田,张海涛.20世纪60年代中西的革命冲动及其艺术后果[J].广州:粤海风,2005:6.
- [9]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4.

[责任编辑: 阳玉平]